

# 辛亥革命与东南亚:密切关系与巨大影响

梁志明

(北京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 北京 100891)

摘要: 毗邻中国、华侨华人聚居的东南亚地区是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党人发动辛亥革命的重要海外基地,同时也是辛亥革命在海外影响最为直接、最为深刻的地区之一。海外华侨是辛亥革命强有力的支持者,而东南亚的华侨又算得上是参与最深,贡献最大。辛亥革命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对东南亚的民族民主革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辛亥革命; 东南亚; 关系; 影响

中图分类号: K25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392(2010)04—0044—09

1911 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东亚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是一次具有跨时代意义的革命。同时,它又是 20 世纪初亚洲和世界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毗邻中国、华侨聚居的东南亚地区是孙中山先生策划、发动革命的海外基地之一,又是辛亥革命的影响最为直接最为深刻的地区之一。回顾辛亥革命与东南亚的密切关系,研讨东南亚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以及研讨辛亥革命对东南亚的巨大影响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 一、东南亚是辛亥革命海外活动的重要基地之一

由于清政府的镇压,孙中山先生和革命党人不得不长期在海外开展革命活动。在海外的革命活动中,孙中山主要是依靠广大华侨。20 世纪初,邻近中国的东南亚国家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共同的遭遇使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命运连在一起,双方的革命斗争彼此呼应。中国的反清爱国志士常以东南

亚为避难地,并在华人社会组建反清复明会党。孙中山先生在革命的发动与准备时期,为宣传革命,组织革命团体,筹集款项,购买军火,策划武装起义,曾经长期在东南亚国家奔波。孙中山出生在广东侨乡,与华侨有着紧密联系,他常在海外华侨中开展革命活动。许多华侨有识人士为挽救民族危亡,跟随中山先生,积极为革命奔走。他们参加了孙中山创建的革命组织——兴中会和同盟会,为建立革命活动的海外基地,传播革命思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东南亚是华侨聚居的地区。据估计,到辛亥革命前,世界各地华侨有 400 多万,其中九成以上分布在东南亚一带<sup>①</sup>。〔1〕〔P43〕东南亚华侨(即南洋华侨)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强有力的支持力量。华人学者颜清煌指出“在外国统治面前,南洋华人无可避免地承受着自卑感的根源是中国的积弱而清政府无能保护海外的侨民。因此,他们渴望有一个可以在海外保护他们,为他们争光的中国;这种渴望,成为海外华人响应革命的主要催化剂”。〔2〕〔P395〕1905 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同盟会是中国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收稿日期: 2011-10-21

作者简介: 梁志明(1935~)男,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① 另据陈树森《南洋华侨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贡献》一文,世界各地的华侨人数约为六七百万,90% 以上在南洋一带。参见《孙中山与华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第 276 页。

它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以民主共和制度取代清王朝专制统治制度的革命目标,赢得了国内亿万民众的广泛支持,也获得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由此,同盟会在海内外迅速发展。不久,在南洋、欧洲、美洲和檀香山(即夏威夷)四地便成立了支部。1900~1911年的11年间,孙中山多次来到新加坡、马来亚进行革命活动。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海外革命活动的重心一度向东南亚地区转移。在孙中山先生的海外革命基地中,以新加坡为联络点的新马地区是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中心之一。

1900年初,康有为以维新派首领身份赴新加坡活动,他得到新加坡富商邱菽园等人的支持,英驻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J. A. Swettenham)还派兵保护。其时日本志士宫崎寅藏赴新欲劝说康有为与孙中山革命党人合作共谋国是。康却诬指宫崎为刺客,将他拘之入狱。为营救宫崎,孙中山亲自赶往新加坡,得华侨人士多方帮助,宫崎获释,这是孙中山首次涉足新加坡。同年10月,惠州起义失败后,黄福、黄耀廷和邓子瑜等兴中会成员避居新加坡。1901年,兴中会成员尤列接踵来到新加坡,他在华人区以行医为名,宣传反清革命,并建“中和堂”,还在马来亚华人聚居区吉隆坡、怡保和槟榔屿等地建立分会,中和堂悬挂惠州起义的“青天白日旗帜”,秘密吸收会员,在新马地区下层民众中拥有广泛的基础。

孙中山赴新加坡首先获华侨爱国人士陈楚楠、张永福之助。陈楚楠与友人张永福,醉心于新学,早具革命思想,曾组织小桃园俱乐部,并联合诸友人联名致电英国驻沪领事,请援保护国事犯条例,勿将英租界内的革命人士章炳麟、邹容引渡给清廷。这一行动被称为“南洋华侨同情革命之第一声。”<sup>[3](P163)</sup> 1904年,陈楚楠、张永福创办了《图南日报》,在东南亚第一次公开鼓吹革命。1905年春节,《图南日报》还印发一种有反满词句和革命图案的月份牌,得到孙中山的热情赞扬。1905年6月,孙中山途径新加坡,在船上同陈楚楠、张永福等人亲切交谈,告知他们德、法、比等欧洲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已成立革命团体,此行到日本将组织革命党总部,南洋各埠可设分会。《图南日报》(1904~1905年)与后来创办的《中兴日报》(1907~1910年)在艰难的条件下,与在东京、香港、上海、檀香山和加州的革命报纸联系,成为中国革命

党人向全世界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媒体。

1906年4月6日,孙中山在张永福的别墅晚晴园成立南洋第一个同盟会分会。首次加盟者有陈楚楠、张永福等12人,陈、张分任正副会长。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是东南亚较早成立的革命组织,得到当地华侨的积极支持。为更好地联络群众和进行宣传活动,新加坡同盟会建立了各种名目的书报社、读书会。主要的有同德书报社、开明演说书报社、星洲书报社和同文书报社等。1908年,同盟会会员发展到近500人。辛亥革命前一年,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也愤而剪掉辫发,脱离与满清关系。<sup>[4](P3)</sup>

当时新加坡是保皇党在南洋的据点,保皇党在此设保皇会分会,以康梁为首的立宪君主派一面宣传爱国维新思想,主张君主立宪,一面又散播保皇主义,以维护清廷统治,在华侨社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1905~1907年,新加坡成了革命派和保皇派意识形态交锋的战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同保皇会为代表的改良派围绕着要不要推翻清朝统治,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要不要实行三民主义等开展了针锋相对的论战。1907年8月,在孙中山协助下创办的新加坡同盟会机关报《中兴日报》是东南亚地区中国革命党人反对改良派和宣传共和民主思想的主要舆论阵地。孙中山在新加坡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他以“南洋小学生”的笔名发表文章,宣传革命道理,号召侨胞从思想上、组织上同改良派划清界线,从此,革命思想在广大华侨中迅速传播,改良派势力一落千丈。

新加坡是东南亚的海上交通枢纽,1908年秋,同盟会南洋支部在新加坡建立后,新加坡便成为东南亚地区革命活动的联络中心。同盟会南洋支部从此地出发把革命的势力向其他东南亚国家传遍。孙中山派人到南洋英属和荷属各地的华侨中开展工作,英属马来亚各地仿效新加坡的办法,以书报社为掩护,纷纷建立了同盟会分会。除越南的同盟会分会建立较早外,其他东南亚国家如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英属缅甸和暹罗(泰国)等相继成立了同盟会组织,1911年美属菲律宾也成立了同盟会分会。到1908年秋,东南亚英荷两国各属地就建立了同盟会分会或通讯处有百数处,<sup>[5](P80)</sup>当时的情况,可以说的是“凡有华侨所到之处,几莫不有同盟会会员活动之足迹。”<sup>[6](P42)</sup> 1909年中山先生把同盟会南洋支部迁到马来亚的庇能(即槟榔屿),槟榔屿成为同盟会在东

南亚的一个新的活动基地,《光华日报》成为南洋同盟分会的总机关报。这样,以新马地区为中心,东南亚各地的以华侨爱国人士为骨干建立的同盟会,为国内革命活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并“负起了海外革命宣传、筹款、策划中国国内起义等重任”。<sup>[6] (P42)</sup>

## 二、东南亚是辛亥革命前期武装起义的前进基地

1894年夏,孙中山向直隶总督李鸿章投书,论证了国家富强之道,要求改革制度,指出只着眼于坚船利炮是舍本逐末。<sup>[7] (P1-13)</sup>但遭李鸿章拒绝。上书的失败,使孙中山决心发动武装革命。从1895年广州发难至1911年武昌起义的16年中,为推翻清朝统治,孙中山先后发动了11次武装起义,这一系列的武装起义是辛亥革命的演习,为革命的胜利,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队伍。1905年同盟会建立后,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人就策划在南疆粤桂滇三省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建立革命基地,而后北上推翻清朝政府。因而1905年后的几次起义都是以毗邻华南的东南亚为前进基地的,而紧靠中国南疆的越南是起义的出发地和指挥中心。

20世纪初,越南有众多的同情革命的华侨。1906年,法属印度支那,主要是越南,有华侨12万人,1910年增到23万2千人。<sup>[8] (P564)</sup>孙中山曾多次到越南,在河内、西贡、海防等地向华侨群众宣传革命,并先后建立兴中会、同盟会革命组织。1900年初,孙中山赴西贡,结识了当地一些侨商人士,取得他们的支持。孙中山还与法驻印度支那联邦总督杜美(又译稻美, Doumer)有交往。应杜美总督之约,1902年秋冬间,孙中山到河内参观博览会,又结识了当地一部分侨商和反清会党人士,并在华侨黄隆生的积极支持下建立了河内兴中会分会。1905年10月,孙中山从日本再次来到西贡,在堤岸等地受到华侨的热情欢迎,在那里亲自改组兴中会,建立了同盟会西贡、堤岸分会。孙中山在越期间,为从事革命活动,足迹遍布越南南北各地。他不仅在河内、海防和西贡——堤岸(今胡志明市)等地的华侨华人中广泛宣传革命思想,成立了同盟会分会组织,1907年还在河内甘必达街61号设立了领导粤、桂、滇起义的总机关,就近策划和指挥南疆三省地区的武装起义。

孙中山和同盟会发动和领导的武装起义得到广

大华侨,特别是南洋华侨的大力支持。据统计,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1908年河口起义,在粤、桂、滇三省边境的六次起义期间,募集的革命经费298550元,南洋华侨捐款占66.82%。1911年黄花岗起义总计收到各地华侨捐款224443元,其中南洋华侨115143元,占51.3%。<sup>[9] (P507)</sup>处于起义前沿的越南华侨踊跃捐输,作出了重大奉献,涌现了许多感人的事迹。西贡华侨商人李卓铎为支持防城、镇南关和河口等地的起义,一人就捐献军费几万元。1905年12月,孙中山在日本横滨发行“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债券,作为以后还本付息的凭据。到西贡后又印制了百元面额的“中华革命政府债券”,分给捐献人。但李卓铎将孙先生给他的10万元债券全部烧掉,以示无偿捐献,不求酬报的决心。堤岸的华侨小商贩黄景南靠卖黄豆芽谋生,平日节衣缩食,每天把赚的钱投入扑满,作为向革命捐献的储蓄,他一次就把几千元钱献出。华侨挑水工人关唐,每担水仅值一分钱,他却将半生血汗积存的3000余元全部捐献为起义军饷。<sup>[10] (P162)</sup>越南华侨踊跃捐输的行动和爱国奉献精神得到了孙中山的高度赞扬。海外华侨的捐献是孙中山在国内外开展革命活动的物质基础,没有华侨在资财物力上的大力资助,国内的武装起义是无法进行的。

1907年5月至12月,孙中山先生在河内先后策动了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黄光山起义、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之役和河口之役等武装起义。这些起义都是以华侨为中坚与骨干力量发动的。1907年5月的潮州黄冈起义是新加坡华侨许雪秋指挥的;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是新加坡华侨邓子瑜指挥的。这两次起义的主要骨干都是新马地区的华侨。在广西中越边境发动的几次起义的领导人 and 骨干则大多为旅越华侨。广西壮族“会党”反清起义被镇压后,“会党”首领王和顺、黄明堂等先后进入越南,他们加入了同盟会,接受了任务,回到广西,联合广西“会党”起义余部和“新军”,先后发动钦州、防城、镇南关、钦廉上思以及河口等地的武装起义。<sup>[11] (P901)</sup>1907年9月1日,任革命军“南军都督”的王和顺率领的短枪队发动钦廉起义,这支队伍均由越南华侨组成。在同年12月发动的镇南关起义中,起义军“南关都督”黄明堂率领在广西边境活动的“会党”武装一度攻占了镇南关的炮台,给予了清朝统治

以沉重打击。

在镇南关起义中,孙中山率同盟会领导人黄兴等奔赴前沿阵地,登上镇南关炮台,嘉奖起义军将士,并亲自指挥发炮,轰击敌军。他还为伤员裹伤,并到附近壮族聚居的村子访问,向当地农民宣传革命。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在钦廉上思起义中率领越南华侨青年200多人组成的起义军直接参战,“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阻,敌人闻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之大著。”<sup>[12] (P204)</sup> 1907年至1908年间的多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孙中山没有气馁,他激励大家“鼓其勇气,乘此良机重谋大举”,强调只要作“充分之筹备”,革命是会胜利的。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榔屿召开同盟会秘密会议,研究、部署新的起义计划。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统一了思想,决定积极筹集巨款,集中人力,在广州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1911年4月27日(农历3月29日)爆发的震动中外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获得各地华侨的积极响应。仅从新马回国参加起义的华侨革命志士就不下500余人。越南华侨以打石工人石锦泉为首,组成敢死队回国。缅甸和荷属东印度也有华侨回国参加起义。<sup>[10] (P156~157)</sup> 这次起义因事先消息泄漏和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起义中牺牲的烈士80多人,内有72人的遗体被收葬于广州黄花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在这72位烈士中,2/3是华侨。据有的著作记载,在辛亥革命中死难的华侨烈士中,来自东南亚的华侨共有33人,而越南华侨或曾侨居越南者有18人之多。<sup>[13] (P294~295)</sup> 广州黄花岗起义是同盟会领导的历次起义中影响最大的一次,孙中山说“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未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慨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sup>[12] (P207)</sup> 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但革命烈士可歌可泣的精神激励了国内外革命者,不到半年,就爆发了武昌起义,并终于导致清王朝的覆灭。

这一时期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与东南亚的民族运动是密切相连的。1907年,孙中山在河内指挥起义时,在革命活动极为繁忙的情况下,曾与河内“东京义塾”的教师们几次笔谈,对越南人民的斗争表示真诚的同情和支持,对越南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深表关心。孙中山与越南抗法起义的领袖黄花探、潘佩珠均有联系。1907年的镇南关起义和1908年的河口起义得到

越南人民的大力支持和掩护。镇南关起义有数百越南少数民族群众参加。起义失利后,革命党人又疏散到黄花探的武装斗争的根据地——北江省藩昌基地休整。1910年后,潘佩珠把购买支援黄花探义军的500支枪中的480支转送给同盟会,以支援中国革命党人的武装斗争。<sup>[14] (P138)</sup>

### 三、辛亥革命与孙中山思想对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国际局势的变动进一步促进了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似乎从一个侧面让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的被压迫者们看到了希望,鼓舞了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的爆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为亚洲树立了榜样与范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潮的传播,亚洲的觉醒,促进了东南亚的民族觉醒。

从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的进程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东南亚兴起了民族解放运动,先后形成了两大潮流:

一是改革运动与现代化的潮流。泰国的朱拉隆功改革、菲律宾的宣传运动、越南的维新运动、印尼的至善社和伊斯兰联盟的改革运动以及缅甸的青年佛教活动等,都属于这一类型。19世纪末、20世纪初,泰国的朱拉隆功改革是泰国曼谷王朝上层为挽救民族危机,增强中央集权的防御性而进行的现代化改革。而菲律宾的宣传运动等则是在东南亚封建社会濒于瓦解或已被列强征服的情况下,代表脆弱的东南亚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政治改革运动。这些改革运动提出了发展民族工商业、扩大民主权利、发展现代文化教育的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着进步作用,并有利于启发民智,促进民族觉醒,是东南亚国家现代化的起步。

二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潮流。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掀起了争取独立的激烈斗争。这一时期,东南亚现代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摆脱了旧的复国主义的窠臼,有了新的内容与发展方向,具有新的时代特征。中国辛亥革命以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成为东南亚许多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纲领。在斗争中,涌现了杰出的民族运动的领袖,有些民族主义领袖经历了从君主立宪主义者向民

主共和主义者的转变,不同程度地与工农群众联合起来,开展群众性政治运动或武装斗争,以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为目标,斗争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

因而,从广阔的全球历史视野来观察,辛亥革命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也是20世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英国历史学家D·G·E·霍尔说“在20世纪初期,人们可能会看到在东南亚历史发展上有深远意义的新因素。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已有了空前的自觉。”<sup>[15]</sup> (P822)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初“亚洲觉醒”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东南亚国家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使被殖民统治的东南亚国家看到挣脱殖民枷锁的光明前景,增强了独立自主的信心。

在海外开展革命活动的过程中,孙中山曾多次到过东南亚国家。有学者考证,他曾11次到新加坡,5次到马来亚,5次到越南,2次到暹罗(泰国)。另据台湾学者蒋永敬的研究,孙先生曾2次至河内,4次到海防,11次至西贡堤岸,1次至美荻、沙洲;9次至星洲(新加坡),2次至芙蓉、吉隆坡,1次至怡保、太平,3次至槟榔屿;2次至暹罗。<sup>[16]</sup> (P521) 孙中山通过与东南亚国家的民族主义领袖交往,或通过华侨及其革命报刊与实际的革命活动对东南亚国家的独立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于地理、历史与文化的密切联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和辛亥革命的胜利,对越南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明显。在越南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越南国家人文社会科学中心主任阮维贵教授在开幕词中说,辛亥革命是中国20世纪三大历史性事件之一,是中国后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转折点。他还说“对于越南来说,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越南20世纪初的革命运动和越南爱国者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sup>①</sup>

20世纪初叶,中越两国处境基本相似,现代化发展都仍处在准备时期。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对越南产生了颇大的冲击作用,而中国的戊戌变法运动则对20世纪初兴起的越南维新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巨大影响。当时的法属越南,由于殖民经济的开发,经济与

社会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动,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工商业和新的市民阶层,但民族资产阶级尚未形成,因而新的思潮是通过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中的进步份子为桥梁输入越南的。中国维新派的新书所传播的思想在当时越南的进步知识份子中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这些新书扩大了他们的眼界。熟谙汉字汉文的越南知识界通过阅读中国维新思想家的著作和早期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著作的中译本,如卢梭的《民约论》、蒙德斯鸠的《法意》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等,接受了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了解了世界的变化和亚洲发展的新潮流。正是他们将新思想新文化传播到越南民众之中。

越南民族运动的领袖潘佩珠是越南爱国儒生的代表。1904年潘佩珠建立维新会,接着发起“东游运动”,组织数百名越南青年赴日留学,走上维新救国道路。他于1905年取道中国到达日本。在横滨认识了旅居日本的梁启超,并受到梁的热情接待。潘佩珠阅读梁启超的著作,接受梁启超的影响。在创建维新会时,潘佩珠主张恢复阮朝君主制,与梁接触后,转而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潘佩珠发动东游运动是企图获得日本援助,抗法复国,梁启超提醒他要提高警惕,依靠日本取得民族解放是行不通的。虽然潘佩珠开始没有听取这一意见,但后来日本与法国勾结,压制东游运动,解散了越南留日学生组织——公宪会和同文书院,把越南留日学生驱逐出境,潘佩珠也被勒令离开日本,方兴未艾的东游运动夭折。这使潘佩珠认识了“日本之不可恃”,并转而“倾向于中华革命党及世界各民族之我同病者”。<sup>[17]</sup>

梁启超对越南民族独立和发展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他劝告潘佩珠在世界进步潮流面前应注重教育,培养人才,鼓励青年出国留学,开启民智,提高民气,蓄积力量,以待时机成熟等等。潘佩珠听后大受启发,感到“此时脑界眼界为之豁然,深悟以前思想及诸经营,皆孟浪荒唐,无足取者。”<sup>[17]</sup> 在梁的帮助下,潘佩珠出版了《越南亡国史》等书,运回越南,以推动对国内民众的宣传教育。此外,经过梁启超的介绍和引见,潘佩珠认识了日本的一些政界人士,并间接地联络了在日本活动的中国革命党人,这使他迅速

① 2001年10月9日,越南国家人文社会科学中心、越南中国研究中心举行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科学讨论会。据新华社驻河内记者张加祥、侯鹤祥2001年10月9日的报道。

打开了在日本活动的局面。

同年,潘佩珠在日本横滨的致和堂会见了中国革命民主派领袖孙中山,并就越南独立问题和中越两国革命发展的关系进行两次长时间的“笔谈”(潘会汉文,但不会讲华语)。在采用暴力革命手段上,两人意见一致,但孙中山批评了越南维新会建立君主立宪制的纲领,主张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听了孙中山的意见后,潘佩珠表示民主共和政体好是好,但认为根据越南具体情况,当时还不能立即实行;在中越两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双方都主张合作,但潘佩珠主张中国革命党先援助越南取得独立,而后以越南北部为根据地,推翻清朝统治,孙中山则主张越南革命家加入中国革命党,在中国革命成功后,中国将援助亚洲各弱小民族,首先是援助越南取得独立。<sup>[17]</sup>这两次会谈虽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和达成具体成果,但两国民族民主运动领袖的首次会见和联系,为中越两国建立民主共和体制奠定了思想基础。

武昌首义胜利,民国建立,越南革命者闻讯欢欣鼓舞,他们在越南维新运动被镇压,革命处于低潮时看到了新的希望。潘佩珠离开日本后,经中国,到达泰国,与侨居泰国的越侨居住在一起,躬耕养息,等待时机。当他在泰国听到中国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后,异常振奋,立即撰写了《联亚刍言》一书,阐明了亚洲各国人民联合反帝的道理。1912年初潘佩珠与中国革命党人取得联络后,到达中国广州。同年2月,越南革命者聚集在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举行会议。在会上,潘佩珠提出,维新会建立君主制的主张已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今后的目标是要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会议决定改组维新会,建立“越南光复会”。光复会的章程规定,其宗旨是“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立共和国”。<sup>[17]</sup>由此,潘佩珠的政治思想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由君主立宪主义变为民主共和主义。潘佩珠思想的这一巨大飞跃,明显地看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辛亥革命的影响。潘佩珠从1905年在日本与孙中山会见后,初步受到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后又同黄兴、章炳麟等中国革命党人有交往,还参加中国云南留日学生创办的《云南杂志》的工作,经常与中国革命党人商谈革命问题,开展活动,因而接受了中国革命党人的民主主义思想和主张。他在《自传》中说“余因与中国革命党人相周旋,民主思想日益浓厚。”还说“初出发时,以君主旗帜取胜于人,设

使局面尚存,即手段未敢更改,今则局面大变矣,予乃突出于众中,提出民主主义议案。”<sup>[17]</sup>其中所说的“今则局面大变矣”,主要是指辛亥革命胜利后越南外部形势的巨变。

潘佩珠召集越南革命者建立越南光复会,并组建了一支抗法武装“越南光复军”。同年7月,潘佩珠与中国革命者苏少楼、邓警亚等在广州组织“振华兴亚会”,有200多人参加,主要是中越两国革命人士。该会主张振兴中华,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恢复亚洲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与自由。计划第一步援助越南,第二步援助印度和缅甸,第三步援助朝鲜。振华兴亚会的宣言指出,中国得振兴,则东南亚各国由此得强盛,而第一步方针最好是援助越南,赶走法军。<sup>[17]</sup>在越南光复会的领导和影响下,越南国内的反法斗争兴起。1917年8月北部太原越籍士兵高举“南兵复国”旗帜举行起义,一度占领省城,与法军战斗达半年之久。

此后,潘佩珠的政治思想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潘佩珠原本特别推崇儒学,曾说“大哉孔道,佛教、耶稣教焉能相比!”<sup>[18] (P39)</sup>他倡导“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信条,主张“有饭同吃,有衣同穿,同甘共苦”的平均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天下为一家的大同世界”。潘佩珠由君主立宪主义转变为民主共和主义,并对社会主义表示向往。<sup>[19] (P271~272)</sup>他的这一思想巨变与当时世界形势发展和中国民主进步的思想影响有密切关系。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尤其是“联合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思想,以及他对亚洲各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深切同情与支持,使他在亚洲各国,包括越南人民中赢得巨大的声望。1924年孙中山逝世时,潘佩珠亲笔撰写“志在三民,道在三民,忆横滨致和堂两度握谈,卓有精神,殆后死;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被帝国主义多年压迫,痛分余泪泣先生”<sup>[17]</sup>的挽联,表达了对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沉痛悼念之情,也反映了孙中山的思想对潘佩珠的深刻影响。

同年,潘佩珠决定改组越南光复会,按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党的章程,建立“越南国民党”。但翌年他不幸被法国殖民者逮捕,并长期软禁,他的这一意愿未能实现。但到1927年,越南革命者终于在河内正式成立了“越南国民党”,并以三民主义为指导,主张进行民族革命,推翻法国殖民统治,进行世界革命,联合殖民地被压迫民族。<sup>[20] (P274~278)</sup>潘佩珠和越南民

族民主革命派人士与孙中山在中越两国创建民主共和政体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建立的深厚友谊,充分体现了中越两国人民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

辛亥革命对中南半岛的缅甸、暹罗(泰国)等国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缅甸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和杰出领导人、爱国僧侣吴欧德玛于1907年东渡日本,应聘在日本东京佛教大学教授巴利语,经中国留学生介绍,结识了孙中山。他深受三民主义思想的启迪,钦佩中山先生勇于革除陋习(男子留发辫、女子缠小脚)的革命行动,而中山先生对吴欧德玛的卓越见识也异常赞赏。两位革命家就中缅两国民族解放运动、争取自己祖国的独立和推翻封建统治进行了交流。共同的理想信念和斗争需要将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吴欧德玛回到缅甸后,投身民族解放运动,喊出英驻缅总督“克拉多克滚回去”的口号。他与缅甸人民团体总会一起开展“温达努(即爱国的民族精神)”运动。他在仰光和曼德勒等地的群众大会上一再热情洋溢地说“缅中两国人民是亲兄弟,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sup>[21] (P303)</sup>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吴欧德玛闻悉后无限悲伤,他长途跋涉专程赴华参加葬礼。吴欧德玛和孙中山两人的交往和友谊,是中缅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中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的历史见证,也是中缅友好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泰国,1904年,华侨爱国人士便在曼谷创办了用中泰两种文字出版的“暹华日报”,并与香港的革命派报纸“中国日报”联系。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建立后,1908年11月,孙中山从新加坡到曼谷,并向华侨发表演说,号召推翻清廷,建立共和,受到热烈欢迎,出席者数百人。1908年11月泰国成立了同盟会分会。

在亚洲觉醒和中国辛亥革命思潮的影响下,泰国留学国外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官员,接受了民主思潮的影响,对旧的君主专制制度不满。1912年发生了一次试图推翻国王统治的未遂政变。这是由激进的青年军官和官员组成的青年官员联谊会策划的。这次革命事变虽因有人告密而被镇压,但却为后来的君主立宪的革命政变奠定了基础。1927年泰国建立“民党”,提出“推翻贵族专制,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口号。民党左翼革新派领袖比里·帕依荣的思想既受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又受到孙中山思想的影响。

有学者指出“比里·帕依荣的理论中,有明显的孙文主义的印记”。<sup>[22] (P57)</sup> 民党的成立及其活动为1932年泰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变的成功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sup>[23] (P387~388)</sup>

辛亥革命和孙中山思想对东南亚海岛地区国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除了前述新马地区外,突出的是荷属东印度。20世纪初,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是内外因素促成的。内部因素是荷兰殖民统治与印尼各族人民之间的民族矛盾,而外部条件则是“亚洲觉醒”的革命浪潮推动的。其中,中国的辛亥革命对它的影响和推动最为有力而深刻。

回顾辛亥革命对印尼的影响,首先还是要谈到华侨。列宁说过,是华侨“从本国带来了革命运动。”<sup>[24] (P488)</sup> 这一论说无疑是有道理的。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是华侨作为桥梁,将中国革命的信息传播到了印尼;另一方面是印尼人看到中国革命胜利后国家地位的提高和华人民族精神的昂扬,从而促进了印尼人的民族觉醒,推动了印尼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印尼的华侨人数激增。据荷兰当局的统计,1860年全印尼华侨人口为221438人,到1900年增加到537316人。<sup>[25] (P557)</sup>

20世纪初,孙中山在新马地区的革命活动促进了印尼华侨民族运动的发展。1906年新加坡同盟分会建立后,1907年中山先生原拟亲赴爪哇开展活动,但被殖民当局禁止入境。同年张榕和吴文波奉新加坡同盟分会的委派,到达巴达维亚,与印尼华侨爱国人士联系,共商建立同盟会分会事宜,并秘密成立组织,取名“寄南社”。这一时期印尼华侨反清革命组织以“书报社”或“学堂”的名义陆续成立起来,华文进步新报刊也相继出版。1907年中华商会在巴达维亚成立,标志着爪哇华商的联合与进步。辛亥革命前,印尼华侨和南洋各地华侨一样为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慷慨捐输,印尼华侨爱国者也志愿回国投身反清武装起义。印尼华侨大商家张榕轩、张耀轩兄弟担任了殖民当局委任的甲必丹、玛腰的职务,又接受了清廷的封赏,但在时局转折关头,也跟随革命潮流,给革命党人筹集经费,捐献巨款。为表彰其支持革命的义举,1912年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为张耀轩亲笔题赠“博爱”大字斗方一幅。<sup>[26] (P250)</sup>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和民国建立消息传来后,广大印尼华侨兴高采烈,欢欣鼓舞,悬挂五色国旗,剪



掉长辫子,涌上街头,游行庆祝。荷兰殖民当局起初虽强行镇压,但在华侨的反对和民国政府的抗议下,不得不释放被捕华侨,惩办枪杀华侨的殖民官员,并表示此后不再虐待华侨。这样在印尼一度出现华侨地位空前提升的局面。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印尼华侨谋求改善自身社会地位的斗争,激发了印尼人的民族觉醒。

辛亥革命对印尼的深刻影响,显著地表现在思想理论方面。20世纪初以后,印尼进步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真理,努力学习和接受东西方各国的革命理论和学说,包括法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学说、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和印度的甘地主义等等,而中国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三民主义学说,对印尼知识界人士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借鉴价值。<sup>[27]</sup>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对印尼民族运动著名领袖、印尼前总统艾哈迈德·苏加诺的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是苏加诺主义形成的重要来源之一。苏加诺对孙中山深为崇敬和景仰。他曾多次谈到孙中山对他的影响,他说他是“在三民主义的影响下,深深地树立了民族主义的思想。”<sup>[28] (P14)</sup> 1956年10月访问中国时,苏加诺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作为一个青年,……我深深受到你们的父亲孙逸仙博士的鼓舞。在青年时代,我阅读过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即民族、民主(民权)、民生鼓舞了我年轻的灵魂。”他还说“后来,我长大了,变得更成熟了。我把孙逸仙博士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生主义加以综合。我把三民主义同我在精神世界里所接触到的伟大人物的理论结合在一起。在这里面,我放进了马克思的理论、恩格斯的理论、甘地的理论、加米尔帕夏的理论;我又把它同印度尼西亚的情况结合起来,我把它同宗教结合起来,把它同印度尼西亚的风俗习惯结合起来。最后,就成为我在1945年里献给印度尼西亚的礼品,它不是三民主义,而是‘五民主义’,或者是‘潘查希拉’(即印度尼西亚建国五基)。”

苏加诺的民族主义的核心理论——“纳沙贡”思想,即印尼的三大政治势力民族主义者、伊斯兰教信仰者、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为民族独立的共同目标,互相合作,加强团结。苏加诺倡导“马尔哈恩主义”,即贫民主义。他用一个自耕农的名字马尔哈恩来代表印尼的贫民大众,主张依靠贫民来实现印尼的革

命。他还于1933年撰写题为《争取印度尼西亚的独立》的文章,提出通过民族独立的“金桥”,走向正义和繁荣的社会,阐述了经过民族革命向社会革命发展的思想。1945年6月,他又发表了“信仰神道、人道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和社会公正”的建国五基的讲话,即“潘查希拉(意为五项原则)”,从而创立了有印尼特色的民族主义为核心的苏加诺主义。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苏加诺的思想与孙中山有许多相似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联合亚洲被压迫民族的大亚洲主义和举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于一役的思想,均对苏加诺主义的形成有过重要影响。

## 结 语

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邻近中国的东南亚地区,特别是新马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们是孙中山和同盟会的海外革命活动重要地区,而越南是华南边境地区武装起义的指挥中心和前进基地。辛亥革命有海内海外两条战线,革命的胜利是国内与国外两股革命力量分工协作、相互配合、共同奋斗的结果。

华侨参与辛亥革命程度非常深,贡献也非常大。董必武曾指出“海外华侨是辛亥革命强有力的支持者。他们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不但从经济上给予了帮助,而且积极参加。”<sup>[29]</sup>如前所述,在建立革命组织、筹措革命活动经费、创办报刊,开展革命宣传和发动历次武装起义等方面,海外华侨,尤其是南洋地区的华侨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可以说,没有海外华侨的参与,就没有辛亥革命的成功。

东南亚地区成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海外的重要基地之一不是偶然的。一是东南亚地区在地理上与中国邻近,与中国大陆来往交通便捷,历来是中国革命者在海外的集结地和活动基地;二是,东南亚地区是海外华侨最集中的聚居地。辛亥革命前夕,东南亚的同盟会会员有3万多人。孙中山先生的“华侨乃革命之母”、“华侨有功革命”的名言,是对华侨,包括东南亚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显要地位的高度评价。

近代民族主义是海外华侨积极投身辛亥革命的思想基础,民族主义的认识成为东南亚华侨支持和参加辛亥革命的原动力。20世纪初,华侨民族主义兴起,华侨爱国人士关心祖国命运,积极参加祖国的政



治运动,成为孙中山革命的忠实信徒。殖民列强入侵造成的民族危机、清末侨务政策的改变、新式学堂和中华商会的建立,华侨与祖国日益密切的联系,为近代华侨民族主义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维新变法运动,特别是孙中山和革命党在海外的革命活动唤起了华侨的民族自觉和爱国情怀,推动了华侨对祖国的关注和政治上的认同。但华侨民族主义有一个发展过程,辛亥革命时期的华侨民族主义尚处于萌芽与初始阶段。学者指出,民族主义具有两重性,可以有两种发展趋势,形成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孙中山主张联合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坚决支持亚洲被压迫的民族独立运动,这种民族主义是爱国进步的,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相区别。民族主义作为三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

孙中山吸纳了西方民族民主学说和东方的哲学思想,提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学说和建国方略,他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在东南亚的民族民主潮流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越南民族运动领袖潘佩珠从君主立宪主义者向民主共和主义者的转变,印尼民族运动领袖苏加诺有印尼特色的民族主义为核心的苏加诺主义的创立,就是鲜明的例证。

#### 参考文献:

- [1]庄国土,刘文正.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
- [2][澳]颜清煌.东南亚华人之研究[M].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股份公司,2008.
- [3]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4]陈嘉庚.南侨回忆录[M].新加坡南洋印刷厂,1946.
- [5]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 [6]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下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 [7]孙文.上李鸿章书[A].孙中山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8]吴凤斌.东南亚华侨通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 [9]陈树强.辛亥革命时期南洋华人支援起义经费之研究[A].吴凤斌.东南亚华侨通史[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 [10]洪丝丝.辛亥革命与华侨[A].辛亥风云[C].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
- [11]张声震.壮族通史(下册)[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 [12]孙中山.建国方略[A].孙中山选集[C].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13]南洋开国史料[Z].
- [14]黄国安等.中越关系史简编[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 [15][英]D·G·E·霍尔.东南亚史(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16]蒋永敬.辛亥前南洋华人对中山先生革命运动的支援[A].吴凤斌.东南亚华侨通史[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 [17]潘佩珠年表[N].越南堤岸“远东日报”,1962年8~9月连载.
- [18][越]陈文饶.从十九世纪至八月革命前越南思想的发展(第二集)[M].河内:越南社会科学出版社,1973.
- [19]梁志明.潘佩珠与潘周桢比较研究[A].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现代化[C].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
- [20][越]丁春林.越南历史大纲(第二集)越文版[M].河内:教育出版社,1999.
- [21]陈炎.孙中山对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与贡献[A].孙中山和他的时代文集(上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2][苏]尼·瓦·烈勃里科娃.泰国现代史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
- [23]梁英明,梁志明等.东南亚近现代史(上卷)[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
- [24]列宁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5]荷印政府中央统计局.1930年人口调查报告[A].吴凤斌.东南亚华侨通史[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 [26]温广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与印尼华侨[A].孙中山与华侨[C].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
- [27]周南京.华侨、辛亥革命与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的兴起[A].东南亚史论文集[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 [28]苏加诺演讲集[M].北京:世界知识社,1956.
- [29]董必武副主席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61-10-10.

[责任编辑:王国平]

( 6) **Empirical Study on Bilateral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Sino-Vietnam after Relationship Normalization**

ZHENG Guo-fu • 28 •

**Abstract:** Since relations normalization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in 1991 ,bilateral trade cooperation has achieved prominent accomplishment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ino-Vietnamese strategic partnership. Empirical study shows that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and Vietnam are an essential “engine” for the Sino-Vietnamese bilateral trade growth. Sino-Vietnam bilateral trade under the WTO system will have bright and broad prospects based on the particular geographical advantage and the feature of economic structure complementary.

**Key words:** Sino-Vietnamese Trade;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globalization

( 7) **The Development of Vietnam’s Oil and Gas Industry and Its Influences on China’s Oil and Gas Export**

BAI Jia • 33 •

**Abstract:** Vietnam’s oil and gas industry develops rapidly; it has played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in increasing it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and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industry.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lack of refining capacity and the depletion of recoverable reserves on land ,Vietnam’s oil and gas industry increasingly relies o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offshore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which makes it face more economic pressures and political risk.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the government has adopted "bringing in" and "going out" strategy ,actively introduc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pursuing overseas oil and gas resources ,which affects the oil and ga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Key words:** Vietnam; Oil and gas industry; Development; Exports; Effects

( 8)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 of Iran-Pakistan-India Gas Pipeline**

SHI Hong-yuan • 38 •

**Abstract:** Although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Iran-Pakistan-India natural gas pipeline has been put forward in the late 1980s of the 20 century ,the pipeline has no substantial progress up to now. There are four main reasons: strong opposition from the America; divergence on the gas price among three countries; the mutual distrust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the lack of sufficient construction fund. Restricted by these factors ,it has a long way to go before accomplishment of pipeline. In the short term ,India will have no access to Iran gas.

**Key words:** Iran; Pakistan; India; Natural gas; Pipeline

( 9)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Southeast Asia: Intimate Connection and Enormous Influence**

LIANG Zhi-ming • 44 •

**Abstract:** Being adjacent to China and overseas Chinese’s settlement ,Southeast Asia is an important oversea base for Revolution of 1911 which launched by democratic party led by Sun Yet-sen ,as one of the places impacted by Revolution of 1911 directly and profoundly . Overseas Chinese are the strongest supporters to the revolution ,the ones in Southeast Asia were deeply involved in and made the most contribution. The sprit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made a profound and lasting impact on national-democratic revolution of Southeast Asia.

**Key Words:** The Revolution of 1911; Southeast Asia; Relationships; Impact

( 10) **Remarks on History of the Great Vietnam in fifteen volumes Written by Ngo Si Lien**

YE Shao-fei ,TIAN Zhi-yong • 53 •

**Abstract:** The Vietnam’s historian Pham Cong Tru recorded that Ngo Si Lien received orders of the king Le Thanh Tong to compile History of Great Vietnam in fifteen volumes ,and it was a official book of history. But from the record of Ngo Si Lien and his experiences of attached a rebel king ,who killed the Le Thanh Tong brother ,he personally compiled History of Great Vietnam in fifteen volumes ,there was no order of the king. The great historian Sima Qian was the model of Ngo Si Lien. There were two official books of history ,one compiled before Ngo Si Lien ,and one after ,recorded detailed and valued by the government ,but the book written by Ngo Si Lien was simply recorded. The king did not valued Ngo Si Lien ,but the great historian personally compiled a good book of history for later generation.

**Key words:** Ngo Si Lien; History of Great Vietnam; Personally compiled